

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高全喜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

一、关于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的初步勾勒

西方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现代社会的兴起，16 世纪初叶的欧洲诸国，尤其是西班牙、荷兰、英国和法国就孕育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早期形态，时至 17、18 世纪，重商主义、自由贸易和重农主义等三个典型的早期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形态上就日渐成熟，其中尤以亚当·斯密等人为代表的苏格兰政治经济学为佼佼者。从某种意义上，亚当·斯密的政治经济学可谓早期现代（early modern）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由它真正地塑造出一门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此后，政治经济学经过李嘉图、马克思以及诸多 19 和 20 世纪经济学大家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更为广阔和多元纷繁的理论场域。

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演变、发展甚至在 20 世纪以来的衰落，这不是本文所探讨的主题。本文在此着重予以说明的是两点：第一，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是基于国家构建和市民社会的形成之双向互动过程中的一种有关国民财富的性质与产生机制的理论探讨，所以，它是与现代国家和现代社会、与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分工、货币流通、信托资本以及自由贸易乃至商业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等）相关联的，因此探讨政治经济学必然要与上述的诸多因素贯穿起来综合加以探讨，也就是说，一个脱离了现代政治和现代社会的完全抽象的政治经济学是并不存在的。尽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体系，但这个体系是与早期现代、尤其是与英国十八世纪的政治构建和市民社会密切相关的。

第二，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趋势，那就是政治经济学在 19 世纪达到了一个高度繁荣之后，很快就开始趋于衰落，甚至退出了主流经济学的领域，新古典经济学诸如货币理论、增长理论、企业理论、产业组织理论、劳动力市场理论等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在晚近以来的经济学界，一种去政治经济学或反政治经济学的思想大行其道，这其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这样一个过程恰恰从另外一个侧面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使命在西方业已完成，也就是说，西方社会或现代社会随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制度化构建之完成，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有关国民财富的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制度前提已经确立，因此政治经济学的最根本的使命也就完结了。现代经济学则是在这样的一个作为毋庸置疑的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和预设之下所展开的有关国民财富的发生机制的内源探讨，可以说，基本的政治的外部性问题不再作为一种变量直接纳入经济学的理论体系之中了。

如上所述，本文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概括，那就是早期现代的政治经济学包含两个基本层面的内容，一个是构建一个国民财富发生机制的政治与社会的前提性制度框架（尤其是主权国家的宪政框架），另一个是探讨在这个框架之下个人财富与公共财富之间的变量关系以及围绕着国民财富而发生的有关劳动、生产、交换和分配等经济领域的

诸多经济关系。上述两个层面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尤其是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内容。现代经济学则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做了较为系统性的层次分离，把原先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抛到经济学之外，政治的归政治，不再加以探讨，而集中探讨第二个层面的问题，并由此分化出诸多理论流派。所以，现代经济学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第二个层面问题的专属性学科制的分化与扩展，但是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现代经济学不再处理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并不等于这个问题不存在，而是把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即经济学的政治性（国家、宪政层面的，非政府政策层面的），作为一个不容置疑的前提或预设而设立了。只不过由于现代经济学的滥觞，原先自明的前提设立，反而在它们的局部扩展中被一步步抽空了，以至于没有谁在提及，就像政治学的利维坦，大家都把它忘记了，或者说它主动藏匿起来了（有人说它在沉睡），但是，藏匿（沉睡）不等于不存在，一旦需要，它会苏醒，现身，那时将是非常恐惧的。所以，我们如果不理解这个现代经济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微妙而严峻的关系，将会铸成大错。

在主流正统的西方古典政治经济学-现代新古典经济学之外，本文还要扼要说一下另外几种变异的政治经济学。第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政治经济学。从学术谱系来看，马克思本人的政治经济学属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而伟大的产物，马克思接续英国李嘉图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把 19 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与德国的黑格尔哲学结合在一起，构建了一种新型的通往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按照马克思的设想，未来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按需分配的社会，所以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有关财富（榨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性也就毫无意义了，因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最终导致的是一种绝对政治的去经济学。从这个视角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具有弥赛亚主义的宗教性质，政治性或对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批判是他的最高教义，这与西方现代去政治的新古典经济学（完全的经济性）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两股劲，而它们的实质是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两个层次的问题，即政治性与经济性，各自片面性地发挥到极致。至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列宁、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过是拙劣地把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教义实证主义化了，搞出了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这个模式把马克思政治浪漫主义（不可实证性）硬性地予以经济化，最终只能导致哈耶克所谓的“奴役之路”。

需要补充的是，马克思主义在现代学术框架内也产生了许多新的变形。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诞生出“分析马克思主义”，有罗默、普沃斯基、艾尔斯特、鲍尔斯等代表人物。这些学者利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工具，重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剩余价值、阶级斗争、剥削等概念，也取得了与新古典经济学类似的技术性结论。然而这种分析马克思主义，割裂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核心观念与历史哲学之间的关联，实际上也是将马克思工具化了。虽然也有很多重要的研究结论，甚至也能为新古典经济学者所接受，但仍然是将马克思主义给去政治化了。

第二个是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现代左派的中心-依附和现代世界体系理论等。古典政治经济学从总的特性来说属于一种“内政的”政治经济学，虽然它主张市场经济、自由贸易、资本无国界等，但其政治性主要涉及内政，构建的是一个民族国家的宪政制度。当然，这种政治经济学也不乏具有那个时代的准帝国性和全球性，但它的政

治经济学之政治的中心还是内政的，也就是说，构建一个政治的与法律的国家制度为其治理下的国民财富或市场经济的自由发展提供保护机制是其政治性的内涵，至于国家间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则是其外部延伸。现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颠倒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上述主次关系，它把国民财富的基础归结为国家间的基于国际政治的经济结果，因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政方面被它们淡化或遮蔽，而放大或突出了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性，并凸显出国际政治的丛林原则。

如果说吉尔平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还注重国际法、国际机制等一些法律化的制度建构对于全球经济财富的正面意义，那么到了现代左派尤其是一些激进主义的新左派那里，全球秩序就遭到了彻底的颠覆，诸如现代世界体系、白银时代以及中心-依附等一些批判性的社会政治-经济理论，它们从绝对政治的高度，结合后发国家融入现代化的失败教训，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及其经济帝国主义（通过科技、军事、金融等手段对于全球资源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的血腥掠夺）展开了满腔义愤的批判和控诉。在它们看来，现代社会上一个绝对不平等的社会，西方国家的国民财富根本不是传统经济学家们所说的是通过劳动、交换等方式创造出来的，而是从后发国家那里榨取和掠夺来的，因此，新自由主义等现代经济学完全是一派胡言。从上述意义上说，它们也属于一种形态的政治经济学，即国际的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这一本质特性倒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与逻辑的同构型，只是时代背景有所不同，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相去甚远。但是与古典正统政治经济学则大相径庭，因为，它们极其内政的制度建设，它们对于西方国家的内政意义上的宪政法治建设对于经济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对于导致后发国家经济失败主因的宪政法治的严重缺失只字不提，一股脑地把责任推卸给西方霸权与不平等的世界秩序，这种解释倒也轻松，只是如何建设，就难免陷入道德主义的乌托邦。

第三个是一种较为狭隘的政治经济学，那就是布坎南等人一再论述的所谓立宪经济学。在我看来，这种立宪的政治经济学只是属于一种公共政策层面的政治经济学，或政府论意义下的政治经济学，并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含蕴的政治性的原初意义，或者说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高度。这派经济学敏感地发现了现代主流的经济学那一套沉迷于关于边际效用、货币供应消费偏好等纯粹的经济性，搞得越来越像代数学，忽视了现代经济的公共性，忽视了政府、宪法以及政策在经济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它们关注政府失灵、公共性缺失、搭便车、权力寻租等问题，试图重新开辟出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政治性维度。但它们对于政治性的理解，还是日常政治，并没有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有关国家建构的非常立宪的深意挖掘出来，因此，它们集中论述的还是一个政府或国家的一般日常政治条件下的公共财政问题，诸如政府财政、税收、福利、教育、环保、医疗等重大的公共政策的政治-经济问题，应该看到，上述问题确实是困扰着西方现代社会的一些主要政治-经济问题，所以，这一派经济学的凸显是有着现实的社会背景的。但是，正像西方现代社会并未面临严峻的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国家以及国际秩序的危机一样，政治问题只是相对的，并没有立国与否的绝对性，所以，布坎南的立宪经济学的政治性也只能具有相对的意义，只具有拾遗补缺的作用，无法成为现代经济学的主流。

第四种新政治经济学是阿罗开创的社会选择理论，或者说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探究社会偏好加总，集体一致的逻辑基础，功利主义的基础以及投票问题。这套理论的核

心是几个不可能定理，如阿罗不可能定理、吉巴德不可能定理、森不可能定理等，证明了现代政治理论根本逻辑前提上的困境，以及解决这些困境所要放松的前提假设。这些理论与正义理论、权利理论、契约理论等现代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的论题有许多重叠的部分，然而毕竟过于抽象和理想化，缺乏历史维度和实证方法，不能对复杂的现实政治问题提供直接帮助。

第五种形态是新古典经济学内部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也是目前新古典经济学家比较接受的新政治经济学，它的基础是一般均衡理论，形态是卢卡斯、萨金特等创造并完善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它的基本想法是把政治“内生”、“经济化”，即将政治博弈、政治策略、政治周期等看作经济增长和波动过程中的产物，以技术进步、知识创新和结构调整等外在冲击作为经济—政治变动的根本动力，在技术上对政治变化做出完美符合经济学假设的解释。然而，这种新政治经济学虽然很时髦，但也遭受包括部分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学者的批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即使在解释经济问题上也存在争议。它比新凯恩斯主义拥有更好的微观基础，然而在一些并非高度理想化的市场上（如劳动力市场），理论与实证结果的契合程度非常低，远不如新凯恩斯主义富有解释力。在经济范畴内的争议尚未完全解决，就进一步将这套理论运用到国际政治上，争议自然就更大。在并不注重理论的数理逻辑基础、而注重力量与真实世界的契合程度以及实践运用效果的政治学界，这套新政治经济学从未真正获得承认。

第六种是从新制度经济学、交易费用理论、路径依赖理论、经济史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政治经济学，最典型如经济学界新星阿西莫格鲁的《独裁与民主的经济根源》所表现出的研究路径。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兰德斯的国家起源理论和格雷夫的以博弈论重述市场发生历史的研究，为现代经济学以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分析工具进入经济史、政治史提供了可能。阿西莫格鲁、迪克西特、巴泽尔等人，以更精致的数学工具综合了上述这些思想，从国际政治、经济历史中抽象出可供分析的制度类型，加以分析。这套分析在探讨局部制度方面非常有力，也能获得实证的有力支持，然而它却无法推广，无法在扩展到对一般政治的讨论。对于政治的根本性认识，文化和历史的复杂因素，往往都难以进入制度分析体系，故而也有很大的局限性。

第七种是通过复杂理论、计算机仿真技术来研究的新政治经济学，代表人物是阿克塞尔罗德。阿克塞尔罗德早年通过计算机仿真来研究“一报还一报”的博弈策略，近年来转向更复杂的大规模、长时段、人类社会的演化博弈仿真。虽然他的仿真研究得出很多有价值的结论，也颇为美国主流政治、经济学界所推崇，但是他既缺乏真正严格的理论基础，也不能将复杂的政治博弈完全地抽象和模型化。故而他的这种新政治经济学，只能为其他理论研究提供参照和启发，而非正式、严谨的研究路径。

第八种是结合了博弈论、实验经济学、人类学和政治理论的跨学科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代表人物有麻省大学的左派学者、分析马克思主义者鲍尔斯、金蒂斯等人，因为很多人都集中在美国桑塔菲研究院，又有人称之为“桑塔菲学派”。这些学者认为，大量的人类学田野调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研究以及演化博弈论的研究，都得出与新古典经济学不符的结论。而一种新的综合性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有可能将这些不同学科的最新进展融合在一起，对政治经济的真实变化过程作

出一套完整的描述。这种研究是开放性的，而且已经吸收越来越多不同学科学者的加入。综合起来看，这套研究的理论核心是演化博弈论，对立面是狭隘的新古典政治经济学。但是这种范式虽然引进足够复杂的资源，却还是没能有效地讨论文化、政治、宗教等真实问题。这套范式所研究的文化、政治和宗教，都是经过理性归纳和提炼之后的文化、政治和宗教，历史和人文维度的理解已被全盘抛弃。因此，虽然他们总在谈文化等较软的元素，但是一般学者都无法接受这一整套的工具主义、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

综上所述，几乎所有新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忽视了对政治的真实含义的反思，而将其去政治化了。

上述我大致勾勒了有关西方政治经济学及其相关形态的初步脉络，尚未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但它们可以为我们进入本题做了铺垫，而且我认为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铺垫，否则谈论我们中国当今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就缺乏大视野的理论背景。

二、中国两个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学与经济学之转换的初步勾勒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关于中国现代社会与西方现代社会其政治、法律、经济、社会的同构关系，我在自己的多篇论文中曾有过专门论述，其基本观点是，从政治逻辑的层面来看，中国现代社会还处在一个早期现代的发展过程之中，现代政治（宪政国家-自由政体）和现代经济（市民社会-市场经济）都还远没有发育成熟，因此，我们很类似于 16-19 世纪的西方社会。而且，中国现代社会的发生机制从一开始又是处在费正清所言的刺激-回应的模式之中，与西方那种（相对而言的）自生演进秩序具有发生学的差异。尽管我们是从 19 世纪下半叶到 20 世纪这一百五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五百年的历程，其中很多关键性的结构性制度并没有建立起来，而这个逻辑是超越不了的。当然，我也一再指出，这个逻辑有中国自身的特殊性，我们不能也无法克隆、照搬西方曾经走过的那一套，但我们也不可能完全忽视或跨过这个历史的峡谷，一步就与西方现时代比肩而立共同迎接所谓后现代社会。在上述这个逻辑的大趋势之下，我们再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本文并不准备处理鸦片战争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而是简单谈一下共产党建国之后（第二共和国）所面临的政治经济学问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共和国与第一共和国乃至于新政相比，是一个多少有些决绝的新时代，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一张白纸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毛时代是一个新的现代中国的开始，这个开始到今天大致经历了六十年，又可以分为两个时段，前三十年与后三十年。前三十年属于一个绝对的毛的革命与创新时代，是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发轫、推进乃至破溃的时代；后三十年则是一个邓时代，即邓领导的改革开放，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现代社会的转型阶段，这个时代是一个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发轫与发展并且面临巨大危机的时代。

下面我着重从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两个层面审视一下中国这两个三十年的演变。我前文曾经论述了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所展开的两个基本的层面以及从古典政治经

济学到现代经济学的转变，指出政治经济学的退却与现代经济学的凸显。从形式上来看，中国的这两个三十年，也似乎经历了一个从政治经济学到经济学的转变。但是，这种转变所具有的意义相比西方来说，却是大不同的，甚至是大相径庭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以双重的失败而告终的。首先，我们的政治经济学在前三十年是一个变异了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最后与之伴随的是国民经济的即将崩溃，而后三十年的经济学，则又是一个水土不服的现代经济学，以至于到目前，为世人痛斥，难以为继。其实，在我看来，中国的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之双重失败，从一开始就隐含在其内在逻辑之中了。

我们知道，西方现代社会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面临的两个任务都是建设性的，一个是构建一个现代的国家，或者一个宪政国家，一个内政的主权形式下的有限政府及其相关的政治的公共性；另外一个则是在上述的政治公共性的保障前提下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从而催生出一个蓬勃发展的国民财富的动力机制，由此构建出一个基于国民财富的发展为目标的市民社会。古典政治经济学所提供的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构造原理，是藏富于民，也就是说，一个现代政治，只有把财富的动力机制交付给作为个人的公民个体，由他们自主的追求他们的合法利益和满足他们的需要体系，并通过法律机制限制政府权力，以及一切非法的侵权行为，维护一个有序的宪政秩序与市场秩序，那么，这样才能够培育出一个繁荣的市民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重要一派，如亚当·斯密，他们强调劳动分工、看不见的手、自由的交换机制，通过最大化的释放个人的能动性，调动起每个人追求财富的创造能力。这一点与重商主义不同，把财富放到自由市场的生产与流通之中，放到个人手中，由他们去创造，而不是通过国家，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论基础。这派经济学因此强调法治宪政、产权保护、自由秩序，这些到了现代经济学那里，已经作为一个基本的前提，为所有的现代经济理论所接受。

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学所说的那个政治经济学，却是彼经济学而不是此经济学。这个彼经济学是作为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奇特成果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或者，更准确的说，是一种前苏联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个政治经济学说到底是一种公有制前提下的计划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是没有计划，个人在自己的经济行为中，按照自己的理性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当然是有计划的。但是，人的理性是有限的，人的计划往往会被社会的偶合市场秩序所破坏，而这恰恰构成了自由的市场经济之动力机制。就整个社会来说，它是一个自生秩序，是一个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当然这个“放任”不是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而是要受到宪政国家之法律制度的约束。也就是说，在法律之下的自由放任的、个人为主的市场经济，是政治经济学所诉求的国民财富的症结点。但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却与此完全相反，它是一种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中央计划主导的、低效率的、没有给市场经济留下任何空间的政治经济学，对此，米塞斯、哈耶克以及奥地利经济学都有过系统的批判。

后三十年可以说是随着中国社会转型而开启的一个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的时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三十年校正了前三十年的政治经济学的某种重大的偏差，摆脱了政治经济学的路径依赖，搞出了一套新的模式，但是，问题恰恰也出现在这里。因

为中国后三十年的现代经济学，它引进的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可是这种现代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前提在中国却是阙如的，也就是说，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作为共设和前提的现代宪政国家与法治秩序。因此，在这样一个空白点上，将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直接吸收过来，企图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促进中国的国民财富的健康发展，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现代经济学或者说所谓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经济学，在中国所导致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既然缺失正义的政治，丑恶的政治必然登场，由此，一个扭曲的怪胎——权贵资本主义，或者说坏的权力+坏的市场经济，这就是后三十年代经济改革的恶果，作为其理论证成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难辞其咎。

这里的后三十年是一个笼统的说法，更准确地说，是后三十中的后十五年。正是在这一段时期里，中国的经济学彻底甩掉了政治包袱，以独立的、由现实的经济增长赋予合理性的姿态，在中国极为广泛地传播开来。在这个过程中，有两股力量起到了极大作用。其一是大学对西方经济学的引进和教育。中国大学的经济系以“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为主要目标，以学习和写作规范的新古典经济学论文为手段，大规模地引进西方教材，突出数学工具，而相对忽视理论对现实的描绘与阐释。随着越来越多的经济系学生出国和学成归来，随着北大、武大等著名高校相继建立专门培养与国际主流经济学接轨的研究中心和培训班，使得经济学完全被西方经济学所挟持，变成一件无可改变的事情。其二是现代新兴媒体在本世纪初的迅速崛起。随着以《财经》为代表的现代财经媒体崛起，大量研究者通过阅读和了解张五常的论文、随笔来学习经济学。他们的工作使得经济学门槛极大降低，许多普通读者籍此获得了丰富的经济学常识，同时也忽略了真实经济必须要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等要素相结合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影响，也使得经济学逐渐变成“黑板经济学”，而不再思考它与其他因素的互动，变得越来越教条。

由此可见，现代经济学只是西方的现代经济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原理，其有效的半径是受到限制的，它是以西方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能涵盖下的领域为前提的，在现代的宪政国家制度没有有效建立起来的地域，这种现代经济学的功能是十分有限的，甚至会导致相反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前苏联解体之后，在相关国家进行的所谓“休克疗法”，即企图通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来塑造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其失败显然是必然的。因为现代经济学并不具有古典政治经济学那种双重的功能，它只能在一个完备的宪政体制内塑造出一个发达的市场经济，如果没有前一个基础，结果将是不可预期的。同样，对于后发国家而言，由于后发国家大多并没有经历过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双重的构建过程，现代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于那里的市场秩序的建立、扩展，功能也是有限的。相比之下，我们看到这样一种独特情况，即一些威权国家或地区通过推广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产生了某个时段内较为积极的成果，如曾经显赫一时的亚洲四小龙等。这些相对成功的案例，并不能说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多大的特殊功能，而只是表明这些威权国家，至少在形式上与宪政国家有某些相同之处，大致具备了一些作为现代经济学所必须的政治要素，例如稳定的乃至法治的秩序。

中国的后三十年是一个经济改革、社会转型的三十年。由于我们既不像前苏联那样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全盘解体，也不像后发国家那种陷入中心与依附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能自拔，我们搞出了一个吊诡的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们的这一模式，固然成

绩卓著，但也问题巨大，在政治体制不改革的情况下，经济改革难以单腿独进，从这个层面来说，中国的现代经济学乃至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走到了死胡同，或者其扩展空间已经用尽。经济的问题经济解决，政治的问题政治解决，这才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平衡的结构，我们现在是到了重提政治经济学的时候了。

三、我们需要怎样的政治经济学？

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到了难以为继的现时代，关于经济改革的反思，关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声讨，乃至对于整个主流经济学家的批判，已经变成了公共话语，对此，我们应该审慎的对待。我反对那种情绪化的道德批判，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哪些是它们能够做的，哪些是它们做不到的。我觉得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三十年在它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还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的。第一，它们有效地破除了苏联式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一套计划经济，把一个西方社会的完备的主流经济学植入到中国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之中，没有这一派现代经济学的持久努力，我们很难走出政治经济学前三十年之窠臼。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是在一个独特的而严峻的威权政治的条件下进行的，在如此狭仄的空间下，新自由主义努力推进个人产权以及市场经济，力主国退民进、市场秩序等等，致使一个相对的市场经济建立与发展起来，三十年的成就可圈可点，不容抹杀。

问题在于，中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盲目回避问题，不能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理论的限度与实践的边界，企图用经济化约政治，用现代经济学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当然，现代经济学家只是一种专业化的经济学家，也大可不必要求他们但当政治经济学家、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所应承担的学科责任。而且，中国社会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权贵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权力寻租、政府黑社会化、国企垄断，等等，也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无力解答的。为了应对上述问题，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重提政治经济学，近些年来，这个政治经济学的问题，很多经济学家都讲过，吴敬琏讲过，韦森讲过，秦晖讲过，姚中秋讲过，卢周来讲过，我也讲过。我现在提出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何种政治经济学？本文在前面曾经归纳了政治经济学的几个形态，总的说来，大致有三种：一种是英国的洛克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一种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一种华勒斯坦、安德森等人为代表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三种政治经济学对于我们来说都有重大的相关性，而且它们又都是各自独立的，有些甚至相互对峙的。如何把握这三种政治经济学的各自本性，结合中国六十年尤其是后三十年经济变革的状况，从而选择一条中国未来发展的政治经济学道路，不但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而且更具有现实的迫切性。

我们先来看第三种，关于这套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并没有一个自成一体的系统、严密的理论形态，它们是多种各自独立的社会与经济理论的通称，如佩里·安德森的马克思主义新左派思想、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弗兰克、卡多索、阿明的中心-依附理论，等等。总的来说，这一套繁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他

们的一些核心理论观念来自马克思与列宁，尤其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理论，列宁的被压迫民族理论、帝国主义理论，等等，马克思主义是他们极其重要的思想资源。第二，他们又都是一些后发国家的、反西方中心主义、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的、反全球化的理论。他们对于人类历史，尤其是世界经济史，有一个反对帝国主义的中心-依附的历史叙事，他们认为西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凭借政治、经济、军事与科技霸权，不公正地掠夺了全球的各种资源，造成了人类财富的巨大不平等，因此全面对抗西方帝国主义才是经济学的本质所在。第三，这派经济学是一种单纯的国际或全球政治经济学，他们很少或根本不去处理后发国家的宪政建设问题，一股脑儿地迷恋于对抗全球一体化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全球垄断和资源掠夺，他们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绝对化了，严重忽视了作为内政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关注后发国家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自身的政治性和经济性、宪政国家和市场经济之平行的内政制度构建。我们看到，这样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对于中国的某些理论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中国的新左派就完全接受了这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范式，他们就认为中国已经全面进入到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铁幕之中，中国的问题是如何打破全球资本主义垄断对于中国人民的物质与精神上的奴役，从而获得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彻底解放。

我们再来看第二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政治经济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当前的经济体制还远没有摆脱这个政治经济学的约束，甚至在新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这种政治经济学又以某种新面目出现。例如，政治国家对于国民经济命脉的全面掌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宪法确立，国有企业的强势垄断，三十年来，这个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并没有变化，我们根本性的经济制度还依然是六十年没有改变的这一套。当然，这样说并不等于没有任何变化，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周边地带还是让渡出了一个市场经济的空间，单向度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经瓦解，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宪政国家的政治性并没有出现，于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权力与市场经济勾结的黑洞出现了，这才是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所在。对此，如果全面回复到前三十年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那里去，全面清除市场经济，或许从理论上说可以解决上述黑洞问题，但从邓时代回到毛时代，这个政治经济学的复辟如何可能呢？

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种，即古典政治经济学。关于这个古典政治经济学，前文已经多次论及它的双层建设性功能，在那里，政治与经济是携手共进的，一个完善的自由市场经济必须依赖一个宪政国家，一个现代的宪政国家必然会约束权力的专横而培育出一个自由的工商社会。这两个部分的协调发展为西方现代社会的早期发育和后续发展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所以才有西方国家五百年的政治繁荣和经济强大，使得他们在现代世界的舞台中占有主导性的地位，才产生了新老帝国主义。对于我们中国来说，为什么要重提政治经济学问题，就是要解决中国当前面临的严峻问题，指出经济社会的改革动力机制已经用尽了，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宪政国家的政治性，为经济发展提供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揭开经济改革的铁盖子，才能走出目前的经济困局。中国社会变革的逻辑应该是一个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三十年的问题在于，我们企图用经济改革单腿迈进，这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诸大的国家来说显然是不行的，现在是改弦更张的时候了，中国的进步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回到古典政治经济学双层构建之路。如果我们能

够审慎而又稳定地走好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步，补上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制度前提，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

当然，谈到古典政治经济学，我们还要认清这样一个问题，即重新回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并不意味着是照搬那个时代的制度模式，因为历史是不能重演的。这里强调的是内在的政治逻辑，这个逻辑可以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政治经济学构建所分享，关于这里面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在我的一系列论著中多有论述，不再展开。此外，我还有一个补充，即前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本文强调的只是一个基于内政制度的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它们还有对外的一面，那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但这个方面是根基于内政的政治经济学之上的，与沃勒斯坦等人的那一套是不同的。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应该积极参与主导性的国际政治经济事务，而不是对抗主流世界，其实洛克、亚当·斯密都有一套主动构建世界秩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要学习，我们也要学习这个版本，而不是新左派的版本，而要立足于世界，关键还是把内政搞好，这个重心偏于宪政建设的政治经济学，才是我们当前真正需要的政治经济学。

主要参考文献：

- 斯密，《国富论》，华夏出版社，2005年
-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华夏出版社，2005年
- 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
- 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吉尔平，《全球政治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
- 米塞斯，《社会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 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 德雷泽，《宏观经济学中的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
- 阿罗，《社会选择：个性与多准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0年
- 阿塞莫格鲁，《政治发展的经济分析》，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年
- 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复杂性》，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梁捷同学对于我的初稿给予较大的专业性修改，多有贡献，在此表示感谢。当然，拙文的责任由我自负。此外，文本还只是专为本次会议提供的草稿，尚需修改，请勿公开刊发。